

访谈 | 吕频
艾欣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4期

2026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十年间，专制政治 背景下中国女权运 动的发展



吕频



艾欣

编按：“三十年前，当我投身女权运动的时候，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环境里是惊世骇俗、令人畏惧的”，中国重要的女权主义倡导者、正在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吕频说。吕频曾为《女声》电子报主笔，也是《女权之声》自媒体的创办人——当然，她所做过的并不止这些。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她投身和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女权活动人士艾欣专访了吕频。这个访谈的主题正如其标题所显示，但内容的丰富、思想的张力却远超出标题所能传递的限度。

艾欣（以下简称艾）：吕频老师，请问据你的观察和研究，中国政府针对女权行动者的镇压形式有什么样的特点？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吕频（以下简称吕）：针对女权主义者，十年间发生了三次影响深远的集中镇压，分别发生在2015、2018和2021年。这三轮镇压的目

标实际上都是同一批人，即“青年女权行动派”（下文简称“女权行动派”）的成员及其主要盟友。自 2012 年以来，她们在中国女权运动中扮演着三重角色：运动网络的构建者、运动话语的生产者、倡导行动的组织者。

女权行动派的活动模式以核心组织者为枢纽，连接分散的年轻志愿者网络。她们公开拥抱女权主义标签，采取引人注目、有时甚至带有挑衅性的行动，旨在吸引媒体关注，并向政府施压，促使其改变政策。国家也一度以在特定政策和个案上的让步作为回应。

然而，随着习近平巩固权力，国家对待公民社会的方式日益从容忍转向镇压，其核心是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将潜在威胁活动定为犯罪，以及对运动采取主动而非被动的压制手段。女权运动的影响力和对抗性刚刚开始增长，却已进入了这种控制逻辑的目标范围。

2015 年 3 月 5 日至 6 日，因为计划在十个城市联合开展反对公共交通性骚扰的倡议行动，多个地区的女权志愿者和组织者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讯问。其中五名组织者最终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在北京看守所被关押了 37 天。与此同时，警方在多个城市对女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搜查。这是国家首次对女权活动进行刑事镇压，后被称作“女权五姐妹”事件。

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批捕，“女权五姐妹”获准保释。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们仍作为刑事嫌

疑人受到持续的监控，其中三人被迫离开她们曾工作的组织。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女权行动派自此被排除在与体制的合作机会之外。媒体对女权活动的报道几乎完全停止；女权主义学者开始与这些活动家及其主张保持距离；非政府组织和妇女组织也停止寻求与她们合作。

2018年3月8日，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媒体平台“女权之声”在微博和微信上同时被永久封禁，理由是涉及“敏感、非法信息”，而真实原因是其在米兔运动中的组织和传播工作。平台工作人员受到警方传唤。与此同时，对女权主义的诽谤开始在网上传流。

3月中旬，一个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账号“酷玩实验室”发布了捏造的指控，称女权之声及其关联人员与“境外势力”勾结实施性犯罪。这些指控得到了广泛传播，针对它们的反驳却受到言论审查。

由于警方的警告，“女权之声”再也没有重建账号，并从此停止了所有公开活动。此后，女权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同时具有行动主义倾向且具备核心影响力的账号，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小型、自发且不稳定的账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21年4月，因为女权活动家肖美丽的一次微博公开发声，一些民族主义账号挖出她多年前发表的内容，将其解读为涉及“港独”和“境外势力”，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她本人及相关女权活动家群体的网络围剿。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大V”账号散布政治指控；数万网民加入攻击行列，进行人肉搜索和威胁；平台大规模删除女权主义者的反驳内

容，并以“有害信息”为由封禁账号；微博运营方和政府机构在关键时刻都对这些攻击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女权活动家遭到警方调查，被警告不得公开发言，并被全平台封杀。

镇压范围随即扩大到广泛的女权和泛女权网络社群：豆瓣十几个女权主义小组被封禁；武汉的一个高校学生社团因组织校园抗议而被取缔。最终，所有遭受攻击的活动人士都在中国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组织过任何活动，而更广泛的女权活动也因此转入地下或被迫终止。

三次镇压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增长及其策略的转变。2015年，国家采取了直接行动，对女权主义者进行拘留和审讯。当时社交媒体的监控和审查机制尚未高度完善，也未系统性地针对女权主义者，因此抗议活动仍能被发布和扩散，从而形成席卷国内外的声援浪潮。镇压所带来的声誉和外交代价，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迫使其选择低调处理。

相比之下，2018年的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有意避免引发无法控制的反弹，其镇压手段变得多样化且间接。第三方被动员起来参与镇压，做国家自身无法做或不愿做的事情，而更先进的审查技术和传播手段则为此提供了助力。女权之声被封号后，曾向多个政府机构申诉，但没有一个机构承认发布过禁令。传播诽谤信息的账号持有亲政府立场，而这场污名化运动虽然充斥着政治和性方面的敏感词汇，并被无数次转发，却从未遭到审查，这成为唯一能让人怀疑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的证据。

到 2021 年，国家与第三方的合作变得更加战略化，甚至无需任何直接接触即可进行。针对女权主义者的攻击由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账号和普通网民发起，攻击的焦点却精准地契合了党国体制的政治敏感性——真正具有破坏性的并非攻击目标所持的女权立场，而是她们被指控支持香港独立并与外国势力勾结进行颠覆活动。

中共安全系统官方社媒账号对这些指控的间接支持，赋予了攻击极大的合法性。包括共青团、中央网信办和地方公安机关在内的一系列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以日益严厉的措辞攻击女权主义。除了“勾结西方势力”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外，还制造“极端女权主义”一词，将女权主义描绘成仇恨男性、制造性别对立、分裂社会。

女权主义被官方定义为国家的敌人，这种转变为无限制的镇压提供了正当理由，使其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并严重损害了公众对被镇压者的支持。大众民族主义与反女权的潮流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的是一种针对女权主义者的全面敌对氛围。每次镇压都针对女权运动的组织核心和基础，导致其组织能力显著萎缩，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为运动幸存者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大众层面，发表女权言论或认领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也随时可能给发声者带来风险。结果是“女权主义”一词在公共讨论中的可见度下降，越来越多地被表述为淡化权利色彩的“女性主义”，或干脆被“独立女性”、“女性力量”等流行词汇取而代之。

艾：这些镇压如何作用于个人？针对女权主义者的镇压是否存在一些性别特征？

吕：国家试图压制的不仅是个体行为，更多是一个群体的持续政治潜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政治行动成为可能的条件。这一目标要求暴力必须是先发制人的、持续的，并融入被镇压者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反应性和阶段性的。同样重要的是，暴力必须保持表面上的不可告人，因为任何明显的镇压行为都会反过来赋予行动者政治可见性。

我把这种暴力形式称为“国家主导的分布式暴力”：在大规模集中镇压之间的空档期，日常镇压的形式日益多样化，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通过激活已存在于日常制度中的国家权力，调动一个分散的加害者网络，涵盖政府机关、企业以及私人层面的亲密关系。在侵蚀行动者的日常生活、限制他们行动的能力的同时，分布式暴力还分摊了施压的成本，使国家免于被问责，阻止了可能的公众反弹。

一位参与反性骚扰倡导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遭遇这些事件：警察前往她的父母家中施压；公司希望她辞职；房东无理由地终止租约；社交媒体账号被连环封禁；物业管理处监视她的行动。这些都无需被宣布为政治行为，每一项都可以使用不同的借口被解释为孤立事件。然而它们同时发生，相互配合，显示出背后存在统一的策划。

这一镇压秩序成立的基础条件是国家拥有高度的强制能力和渗透覆盖力，且市场在国家的管理下不完全自主。同时，性别化的社会秩序可

被用作纪律工具。

中国父权规范通过长幼尊卑的亲属关系、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性化女性的职场文化以及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训，已经约束了女性的政治声音和公共流动。国家可以在关键时刻强化激活这些规范，将潜在的性别偏见武器化，构成对女权行动者的巨大压力。

许多女权运动参与者是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压迫，源于自身与性别相关的多重脆弱性。她们的女权主义认同与一系列生活方式的选择紧密相连，例如保持单身、与原生家庭分居、建立同性伴侣关系，以及在非政府组织、自由职业或不稳定的创意行业工作。这些选择也增加了她们的风险。

如果一位女权主义者没有当地的户口或房产，地方政府就更有借口驱逐她，捉襟见肘的经济储备意味着任何麻烦都可能迅速耗尽她的精力。而被视为性别规范的违背者，使得对她们的压迫被解读为对“不守规矩”的女性进行必要的管教，而非政治迫害。如警方可能会把一对女同性恋者的性取向透露给房东，以此劝说对方解除租约。

在国家的指导下，这种分布式暴力往往具有超法律性和任意性。没有明确的规则把具体行为与具体后果联系起来，因而行动者无法预测镇压何时、如何发生，也没有可靠的规避途径。这种不可预测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方式，不仅限制行动本身，还限制行动者评估自身情况的能力。

对于被标记为敏感人物的行动者来说，困境并非单一的危机，而是一种持续且反复出现的匮乏状态，这种状态在他们搬家、辞职、迁往另一座城市、在网络上噤声，甚至与女权社群断绝联系后依然会持续。

2015年后，除了极少数例外，女权活跃人士没有面临任何刑事指控。然而最终，驱使许多人离开运动的是安全感的丧失、身心俱疲，以及无力感。当这种情况影响到足够多的运动核心组织者时，运动就会失去支柱。

艾：2018年-2022年，在运动环境日益恶劣、公共空间逐渐关闭的情况下，“米兔”运动却在中国爆发，并成功地催生公共倡导和集体行动。这一切如何发生？在去中心化、依靠个人叙事的表象之下，女权主义者如何开展组织性的工作？

吕：通常人们从米兔运动中首先看到的是个人叙事，这当然很重要。但如果眼光只限于此，把米兔主要理解成一种社交媒体现象，这就是冷落了它的运动属性。运动必须是集体行动，不是一个人就能形成一场盛事，而且其中个体的行为也不是孤立和完全自发的。

把社交媒体比作广场，个人叙事就是当事人在无法诉诸制度性的解决渠道时，所采取的数字广场抗议；围绕当事人的声音，背后还有大量的工作在展开。只是由于镇压，这些工作没有机会获得公开承认。

米兔在它开端的2018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持续到3月。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博士生罗茜茜实名举报

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她同时发起联署，呼吁北航创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而当时中国高校尚无此类机制。可见从一开始，不管是发声的幸存者，还是响应她的支持者，都将个案的救济和制度性改变紧密连接在一起。

女权行动派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契机，决定将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倡导工作扩展为全国范围的联动。罗茜茜举报教授的第四天，女权行动派的核心成员张累累发起了“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活动，她担任此次活动的对外发起人，并建立了一个微信协调群，将核心组织者与全国各高校值得信赖的志愿者联系起来。组织者设计了一份针对教育部和高校管理部门的具体政策诉求请愿模板；各校园组织者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并开展自主动员。许多校园成立了行动小组，保持密切的内部沟通，并直接向校方递交了请愿信。活动最终吸引了来自 77 所高校的一万三千多名学生和校友参与。

“万人致信”活动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让反性骚扰机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还在社会、公众层面广泛汇集了一批关心性骚扰议题、有公民意识的人——即使这些人不一定会给自己贴上运动参与者的标签，同时也让教育部和学校成为明确被问责的对象。对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这也是一次重要的练习：此前，学生团体的活动基本都是响应女权行动派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倡导，这是他们首次与管理自身的权力直接对峙。在和校方不断交涉的过程中，学生强韧了自己的校园网络。

3 月 8 日，女权之声遭到官方永久封禁，随后网络意见领袖发起针对女权行动派核心成员的政治和性污名化运动。至此，由经验丰富的女

权组织者领导的第一阶段大规模维权活动宣告结束。其建立的校园网络和行动者群体并未随着全国协调机制的瓦解而消失，而是继续独立运作，只是这场运动已不再拥有面向公众的领导核心。

2018 年 4 月至 5 月是第二阶段，几所精英大学的学生行动者成为新一波运动的组织基础。他们行动的核心是敦促追究个别性骚扰案件的责任，并要求进行制度改革。

4 月初，八名北京大学学生向校方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调查一起教师涉嫌性侵害并致当事学生自杀的案件。在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知名高校，学生也针对涉及教师的案件提出了类似的问责要求，集体抗议和与校方的直接对抗几乎同时爆发。

在这一波浪潮中，学生们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实时公布了大量信息，包括直播与校方人员的沟通和对峙、发布校方对学生施压的证据，并随着事态发展不断更新诉求。

4 月 22 日，北大学生岳昕发布公开信，称自己因积极参与信息公开申请，被校方和家人强行带离校园，软禁在家。这一声明在高校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同情和声援，校园内也出现了公开示威活动。精英大学的特殊环境、紧张的氛围，及学生对运动意涵的拓展——指出校园性侵害问题不仅关乎性别，也关乎学生权益、校园治理和民主制度，种种因素叠加，让事件超出涉事校园的范围，吸引了全国公众的关注，其中也包括一些此前从未接触过性骚扰或女权议题的群体。

校方对学生的问责诉求采取了有限回应和故意拖延相结合的方式。学生的行动在多方面遭到镇压，包括岳昕在内的核心参与者最终在针对性的打击下被迫噤声，抗议的声势逐渐平息。

之后一段时间，米兔运动及公众的关注都陷入沉寂。直到 2018 年 7 月 23 日，一位化名“花花”的年轻女性公益人发布自述，指控知名反歧视倡导者雷闯曾对其实施性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针对公益界、学术界和文化产业人士的类似指控井喷式出现。截至 9 月底，已有 36 名知名人士被公开指控。这些披露，以及随之而来的倡导、问责和法律诉讼，使得性骚扰成为这一阶段最引人关注的公共议题之一。

花花的叙述表明，运动的第三阶段由公益圈开启是有迹可循的：在决定公开前，她经历了一段将自己的遭遇定义为性侵害的过程，社会正义和女权的理念为她提供了思想武器，加速并完成了这种意识的转变。促使她发声的理由具有公共性，即“不希望产生更多的受害者”。

在众多案例中，编剧弦子公开指控并起诉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播朱军性骚扰，由于双方巨大的权力不对等，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作为唯一公开身份接受采访且走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弦子在公共空间持续发声，使她的案件成为米兔运动传播和动员的核心节点之一。

挺身而出的当事人的直接目标，是在制度渠道失效的情况下，让施害者承担社会责任。公开作证是她们的最主要手段：通过讲述自身经历，尽力还原事件真相，从而持续推动公众舆论。

她们的语言都非常冷静，同时包含大量的自我审查。尽管不一定是有意意识的行为，但实际上当事人的谨慎态度也是在为运动的目标负责。在叙述中，她们不断地追问自己，也是在不断地解释一个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当时为什么没有反抗？并由此剖析了行业制度、社会文化如何对性侵受害者施压，以迫使她们保持沉默。

这些特征和米兔后期一些个人叙事偏向煽情的风格完全不同。或许是因为煽情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危险的，它会让当事人显得脆弱、易被伤害，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情绪化”的女性，被公众认为不可信任。当事人既要在险恶的网络环境下保护自己，又要通过表达产生动员效果，这注定是一段艰难的对话。只有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熟悉互联网、对女权舆论有观察和认识的人，才能既引起关注，又不会被反噬。

在个案背后，是隐蔽但持续的组织工作：运动参与者为发声的当事人组建非正式的支持网络；一些当事人还为更多的性暴力受害者成立了专门的支持小组；女权组织者和一些公益组织密切关注个案，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制度问责和行业改革。

然而，当事人越来越发现，她们指认的人往往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后果，反而受到行业和舆论的保护。当事人自身则面临着被以诽谤名义反诉的风险，承受网络审查和骚扰。致力于将运动成果制度化的女权活动家和公益组织则面临着更为强烈的阻挠：国家机构传唤并威胁活动家；培训课程、会议、项目，甚至组织运作都被迫停止。在疲惫、失望和阻碍的重压下，这股浪潮在 2018 年 9 月之后逐渐消退。

艾：尽管针对个人行动和小规模组织的镇压在加剧，但米兔运动在后期的大众影响力仍在持续扩散。

2019 年，Jingyao 诉刘强东性侵案引发舆论关注。在公众对当事人 Jingyao 的言行进行大范围审视和指责之时，米兔运动参与者在网络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话题征集活动，鼓励女性公开讲述遭受性侵和性骚扰的真实经历，以此指认滋长性暴力事件、迫使受害者噤声的社会“强奸文化”的存在。作为一次成功的公共倡导，这一行动让“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成为米兔中的一句有力口号，推动了关于性暴力案件的报道伦理、性别权力结构等话题的讨论。

怎么看米兔在社会文化和公众教育方面的成果和影响？为了让运动在去中心化的情况下自我维持与传播，女权行动者发展出了哪些适应性的策略，这些策略的效力持续到何时？

吕：米兔极大地重塑了参与者自身对性骚扰、性侵与性别权力关系的认知，也前所未有地将反对性暴力确立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公共争议议题。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普遍建立了“性暴力不可容忍”的基本常识，这与十年前的社会意识相比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处每个不同时期，人们往往感到运动即将迎来新的开端。但从 2018 年起，米兔能改变或者不能改变什么，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因为自从学生抗议结束，个人叙事兴起，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这一制度性目标就逐渐被遗忘。

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米兔扩散到了校园之外。但在高校体系内，至少还存在针对涉事教师进行纪律处分的惯例与空间；而一旦脱离了校园体制，便失去了具体的问责支点，无论是个案的追责还是制度性的变革，都变得越发不可能。例如，尽管朱军案所动员的舆论关注远超任何一起高校事件，但其所触碰的权力结构也异常坚固。更有许多个案无法在司法层面立案或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只能被降格定性为内部行政问题或个人道德缺陷，难以推动实质性结果。

而运动之所以全面转向以个人叙事为主，本质上是因为其他所有组织化的行动路径均被国家强行切断。

2018年下半年，女权之声曾计划在陕西开展反性骚扰志愿者线下培训，但所有参与者都遭到了警方的干预与骚扰。那些在运动初期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的人，甚至没有一次安全聚集的机会，去系统探讨如何提供受害者支持、推进倡导工作，因为一切线下组织都被严密防范。

同一时期，女权之声也曾尝试在新浪微博建立名为“你我揭露性骚扰”的账号，作为公共传播枢纽，广泛征集性暴力相关的个人叙事和已曝光的个案。而微博当时的审核机制是：正文可以出现“性骚扰”字眼，但账号名称禁止包含这三个字。这种审查策略的结果，就是人们最终只能分散地发声。

因此，所谓的“去中心化”，实际上是政府策略性地避免运动深化

的结果。运动外在的舆论声势，并不等于其内在的抗争力量。公众的注意力在看不见的审查中被损耗，于是运动转变为一种依赖偶发“爆点”的舆情循环，难以对现有体制构成可持续的压力。个人叙事本身则很容易被制约——个案迟迟得不到公正解决，当事人反倒要承受反诉和网络围剿等代价，后来者自然会受到震慑。

在集体行动转向以话语扩散为主的阶段，还是存在核心行动者的引导。问题在于，运动中的动员和组织具有不同的意义：发起一个联署、设置一个热门话题标签，就会有许多人真诚地响应；而组织工作意味着要把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并持续不断地提供教育和实践的机会。

与“万人致信母校”时期的组织架构相比，后期的动员形式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上却很脆弱。除了单次活动之外，没有其他方式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有的只是组织者与海量的无名参与者。组织者无法确知参与者的具体身份和参与预期，只能不断地投放新的活动来维系人群的在场。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案一审开庭，上百名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前，手持标语，表达对公正审判的诉求。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集体行动，但在它发生之前，就连组织者也不知道实际上会有多少人前往。而后两次庭审，因为警察在现场施行的封锁和搜查，声援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间甚至难以彼此找到。这导致了参与人数的显著下降，而且难以形成有效的呼吁。

又如“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线上征集，尽管参与人数众多，但在境内缺乏安全通讯工具的环境下，组织者未能与参与者们建立长期联系。在类似的线上集体行动中，一旦遭遇封号，参与者便可能彻底与社群失去联结。

行动者依然付出了密集的隐形劳动。女权主义者通过建立数以万计的去中心化群组，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讨论，以维持运动的传播基础。这些话语实践兼具两种面向：一是行动取向，如呼吁向全国人大寄信反对《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二是意识提升取向，如疫情初期发起的“看见女性劳动者”倡导。然而，随着2020年底网信办将“挑起性别对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首当其冲受到压制的就是带有批评和动员色彩的内容，此外还有任何可能形成规模的女权言论。

线下组织层面，高校内的女权小组将学生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让运动有虽然微小但可以存续的结构。不过2021年前后，这些高校小组基本都被禁止继续存在。

2021年的“阿里酒桌性侵案”表明，在高校之外，米兔对文化习俗与行业行为准则的重构是有限的：事件发酵初期，企业迫于舆论压力作出了免职涉事主管并承诺整顿文化的表态。然而随着可能的官方介入与舆论风向转变，事件最终以当事女性被以“散播谣言”为由辞退、在网络上遭遇大规模道德猎巫而告终。也很难说这一案件对中国的酒桌文化产生了多少改变。

2022年8月，弦子二审败诉，可以看作米兔运动终结的实质性标志。这意味着运动的核心诉求，即制度性变革的无望。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法律层面，如规范司法和执法、将性骚扰写入《民法典》，而且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改变各个权力部门处理性暴力的方式。然而在国家安全的框架下，警察的主要功能不是维持治安，而是维护政权稳定，因此这是一个警察严重滥权的时代；司法审判同样深度嵌入维稳逻辑，不会破例为性暴力案件的当事人开辟空间。

艾：在后米兔时期，2022年前后，以持性别本质论、言辞激烈为特点的“激女”话语开始在中国互联网产生影响力，一度成为网络女权讨论的主流，但后来又逐渐退场，回归小范围的圈子和社群。请问你怎么看激女浪潮在中国网络上的兴起和消退，及其与国家对女权议题的审查、镇压之间的关系？

吕：我对激女发表的内容没有太多研究，部分原因是她们和互联网文化结合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亚文化色彩，比如发明很多只有内部使用的词汇，维持一种小圈子传播。

激女是反父权的，而且展现出的受害性非常强，有很多凌厉的表达。不过我的理解是，她们最关心的不是社会改革。她们所强调的问责和改变都指向个人：问责通常是针对在家庭中享有优势地位的男性、个别侵害员工的老板，也可能指向未能达到其标准的女性；针对自身的改变就是不婚不育、积累储蓄，降低个人生存的风险。

激女的联盟也有一种帮助女性的精神，只不过这种“女性帮助女性”限于个人层面的资源分享，而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多资源。这个群体的画像可能很复杂，但很难想象激女的大部分追随者会是在男权社会如鱼得水的人，许多人可能在家庭和社会处于双重边缘，因此才会在网络上表现出极大的愤愤不平。

行动导向的女权主义衰退之后，激女凭借其情绪动员力在网络兴起。但由于反建制的价值观，她们也被封杀严重。

社会运动不可持续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者无法从中获益。早期的女权行动派，少数人还能获得活动家的光环；而之后运动能给予参与者的就不再是回报，只有耗竭。因此许多个人项目都很短暂。一些自发的女权账号可能只有几十、几百个粉丝，还要经历反复的删除和重建，当人们的信心和能量被消耗完了，就会淡出、停更。我认为激女也是这样，在重复的话语和反复被封杀中找不到希望和解决方案。

今天在中国互联网占据主流的是市场女权主义，核心思想是女性应当利用现有条件最大化自身利益。性别平等的标准被简化为职场晋升与财富积累：一位女性成为高管，或取得商业成功，即被视为女权的胜利。

市场女权主义将性别议题运作成了一门生意：把女权包装为一项可营利的事业，或是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市场性的解决方案，让女性

通过消费获得情感慰藉。例如一些“大女主”相关的文化产品，就是创作者与消费者在一种去政治化的安全语境中共同完成的对女权的表演式消费。文化工业收割了女权运动的成果，让社群为之贡献口碑、销量和票房，却并未对运动有所贡献，甚至可能连“女权主义”这个词都不会出现在内容和宣发中。

当然更糟糕的是广泛面向女性的身心灵课程。它们的内核概念是“显化”：你想要成为富人，就要先通过像富人一样生活和消费，提升内心的“能量等级”。尽管荒谬，但身心灵的这一套主张其实也微妙地迎合了女权话语在大众媒体上的普及和简化，即女性要自信、有“配得感”，将困境归因于个人能量不足，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利用受众的焦虑。

激女的情绪、立场不适合被消费，因此在当下的环境里缺乏生存空间；至于响应爱国话语、被一些女权主义者视为生存策略的“粉红女权”，其实也没有太多与体制合作共赢的机会，因为国家已经有足够的妇女模范作为其代言人，例如妇联，女性科学家、宇航员、运动员，不需要民间自发的粉红女权主义者成为领袖。

而市场女权主义的兴起，解决了女权主义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并不是指女权的思想都消失了。如果我们把女权运动理解为，女性的反抗会因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而天然地存在，就会认定国家和女权运动之间的冲突是长期且不可调和的——这是我曾经的理想，现在我意识到这不是事实。女性确实一直存在不满，因为国家不会实质性地解决她们

的平权问题；但是，不满意和不平等可以在现实中共存，即人们都对国家发牢骚，而现实并不因此改变。

国家不需要完全消灭异见，因为异见本身能够带来很多信息。就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把互联网关了”——关了互联网大家都不讲话了，国家不知道人们在想什么。社会失去活力，也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这不是政府所期待的。因此还是要保留一定的言论活动，只需要把不满控制在它可以管理的范围。

我的看法是，当国内的女权主义下沉到小红书上的时候，它就不再与运动有强关联性。或者说，我们现在有不同的女权运动：行动主义的运动已经陷入停滞，而另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运动仍在继续。

艾：从“女权五姐妹”事件，到近几年国家对女权主义的封杀，使一些女权活动家陆续远走海外。近年来在北美、欧洲，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也形成了活跃的女权社群，以包括脱口秀在内各种的具有影响力的形式进行政治表达和连接受众。一旦在中国有和女性权益相关的重大事件发生，这些社群都会积极地作出回应。

海外中国女权运动的组织和行动现状如何？在本土公共空间萎缩的背景下，能否通过离岸社群保存行动主义知识与社群联结？

吕：海外运动存在自身的困境。首先是国家对跨国运动参与和知识传播的阻断。米兔运动时期，很多人从海外为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当时的线上传播和组织来说，参与者身处何地没有太大区别。但现在

国家会通过显示社交媒体的 IP 地址、限制海外登录，以及加强对“西方势力”的妖魔化塑造，来阻断墙内外的联系。

信息无法在海内外传递，倡导就失去了着力点，它的作用可能就仅限于显示团结。团结很重要，但当前在另一个国家——例如美国——去谈议中国政府，无法构成后者需要承担的压力性后果。比如黄雪琴被捕的时候，海外不同地区的女权主义者都通过游行抗议表达了对她的声援，然而这些大部分都不被国内的公众或女权社群所知。

即使不开展和国内议题直接相关的动员，只做知识输入类的活动，也会被高度敏感化。假设请一位伊朗的活动家在线分享运动经验，这也是不可行的。

其次是镇压，除了来自在地国家的，还有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海外运动参与者以留学生为主，他们身处两国之间，处于一种看似便利、实则脆弱的状态。尽管中国政府无法对他们施加日常管控，但镇压之下，他们可失去的东西太多：出国时自身和家庭都负担了沉没成本；并且作为中国人在国内的权利，以及在所在国家作为外国人居留的权利，两者都非常脆弱。

跨国镇压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联系运动参与者在国内的亲属间接施压，或在参与者自身回国期间实行骚扰。这方面的信息远没有得到完全披露，所以人们处于寒蝉效应之中。

于是海外中国女权运动被迫在和本土割裂的情况下寻找自己的议程、

方法，以及动力，但又难以脱离本土议题独立存在。

另一个现实困境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强力，与整个国际社会处在威权上升的环境是相匹配的。人们曾经相信，在威权的反面，就有民主的光明存在，即使它不完美。现在发现其实没有这个所谓的反面。人权、民主、平等不再被视为国际通则，人们对这一切都不再抱有信念，无法想象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因此也正在丧失对社会运动的信心。

艾：关于跨国运动被阻断，有一个近期的案例。针对这两年发生的以“传播淫秽色情”的罪名大规模抓捕海棠文学城作者的事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都有中国女权主义者组织集会和筹款。但从现实来看，以声援政治异见者的思路，期望国际舆论对被捕者的处境有所影响，或是能推动司法改变，可能从结果上都会让声援活动的参与者感到失望；而在国内，对于海外抗议会让事件政治化、敏感化的担忧，反而使得以个案支持为主要目标的事件关注者主动与海外声援者及其主张的“言论自由”等权利诉求作切割。

另一个困难是，中国网络上目前并没有太多具有公共性且能够引发集体讨论的性别事件，公众注意力更多停留在性别矛盾，舆论越发分散和极化。海外关注者即使想借话题发起行动，可能也缺乏着力点。

说到运动的困境，除了在纽约、伦敦这样的文化中心，行动主义的动能相对充沛，海外其他地区的运动似乎也面临与国内相似的社群活跃、但组织者匮乏的问题。你有对于这方面的观察吗？

吕：对于类似海棠这样的事件，海外留学生的示威和抗议可能没有太多策略性，更多是一种情绪表达。但参与者通过这些行动维持自身的抗争意识，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运动的组织者数量少是一种常态，这是经典的集体行动问题。社会运动争取到的权益是公共的，人人都能享有，而抗争需要投入时间和经济成本，还要承担高风险，因此人们出于个人利益会选择搭便车。如果组织者能够从运动中获得奖赏，哪怕只是作为政治反对者的光环，或许都会有更多人愿意投身其中；但现状是组织者几乎没有任何回报，甚至看不到运动的目标和进展，因此这个问题可能的确是无解的。

与中国的现状类似，对海外社群来说，女权主义可以仅作为一种生活和交友方式存在。尤其是对于留学生，拥有社群陪伴就足以抵御在海外生活的孤独感，而无须参与社会抗议。不过，对于少部分以运动组织者身份离开中国的人而言，不管他们在海外能否继续组织工作，都没有改变自身的定位和对运动的关注。

我目前的想法是，如果真的希望海外的行动对中国有所改变，只能尝试回到 2018 年米兔运动初期的模式，以更紧密的跨国合作来应对镇压。困难之处在于，海外运动参与者需要对国内的环境有足够的观察和融入，才能发现开展行动的机会。这意味着抛弃海外的身份，潜入境内网络，承担繁琐的知识翻译、维权支持与跨区域联络等工作。能否投入时间在这些密集的劳动上，只能取决于运动参与者个人的决定。

我们还得改变对行动的理解。如果行动只限于对热点的回应，那是不

是没有热点就没有行动？或者换个角度问，在运动沉寂的时候，是不是只有那些深入运动的人才有事可做，更外围、广泛的参与者就没有机会？

答案可能是：没有那么多容易的事情可做。“容易”是指有人负责拟定议程和框架，其他人只需要跟随行动。而现在人们必须为自己设计议程。

国内女权社群在这方面的实践比海外开始得更早，且形式更多样。典型的有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面向社群的支持性小组、个人或小团队的创意和艺术项目，以及一些带有女权色彩，但不明确打女权旗号和贴政治标签的聚会活动，三者构成了相对不可见的运动生态。

这些形态本身可能都很短命，且因为不在公开互联网，运动外围的人有时会不得其门而入。但正是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一直维持运动到今天。女权主义者需要它们提供的表达、参与和劳动机会，在缺少抗争行动的时期维持自身抗争性的身份，并以此确认自己所信仰的事业还能有所进展。

艾：我有一个长期的困惑：包括我自己在内，国内的这些小组、活动的组织者，在不能直接发起女权话题，也难以公开讨论时政的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还认同自身的行动和社会运动有所关联？

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是，一些组织者尽管出于安全考虑，在活动宣传和内容方面有意识规避敏感议题，但不会对参与者做言论审查，相反

可能在讨论中鼓励参与者对社会事件有所回应；同样地，即使形式相似，这类活动的定位也会区别于主流商业活动，以搭建公共空间而非提供娱乐休闲为主要目标。这些是组织者没有真正远离运动的表现。

吕：我觉得这种自组织形式与市场女权主义不同，后者是对行动主义的替代，而前者只是让抗争的概念和意识变得更隐蔽——对于这一点肯定不能苛责，尤其是活动本身大部分还要依靠女权主义者的义务劳动。

至于这些活动、小组或空间的定位，以及在其中流动的思想究竟有多少抗争性，或许存在一个光谱。但抗争性越强，能见度往往会随之下降。所以重点不是组织形式是否激进，而是其中所创造、维持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女权运动及其政治潜力产生联系。

2022 年的白纸运动，就证明了集体行动如何孕育自青年人的社群。一些抗议活动的核心发起者最初就是因为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聚集，并依靠聚餐一类的社交活动，以及读书会、观影会等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维持联系。在社会矛盾爆发之时，有人迅速作出回应，动员线下行动、在审查下以低调而具有创意的形式传递讯息，乃至在镇压开始后进行救援，这些都是基于已经在社群中积累的信任关系而展开。

艾：延续这个话题，运动被阻断后，未来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有一种观点是，专制国家的人们即使无法直接参与政治行动，仍能够以微观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有效的抵抗。你觉得在当下中国的环境里，

怎么看待这种“微观抵抗”的价值？

吕：研究伊朗的学者阿塞夫·巴亚特提出了“非运动”的概念，意思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活动，以此构成对极权的挑战。

在伊朗，不戴头巾可能会受到监禁，或者在 70 年代的中国，听一下摇滚乐可能就要进监狱，这些都是追求自由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还是有许多不受惩罚的私人活动空间。国家保持管控一切的权力，同时默许人们的一些行为存在于灰色地带，因此大部分人其实未必感受到被压制。

所以，对于所谓的微观抵抗，我的心态很矛盾。我认为它可以是抵抗，但不是运动；但在谈论运动本身已是奢侈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剩下的行动？

我觉得首先要设定讨论的前提。对个人来说，要意识到抵抗是有代价的。不管是在私人场合对性骚扰说不，还是选择一种不婚不育的生活方式，都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社会性风险。

人们当然可以去做更容易的事情，例如以支持女性创作者的名义去买一张大女主电影票。但一个人不可能只在被允许的空间内活动，同时又宣称自己在反抗。认为消费可以替代对行动的参与，这种倾向是危险的。

现在中国流行文化中有一种名为“牛马”的自我认同，源于年轻人对工作强度、效率文化、经济形势的不满。但它实际上解构了很多东西，不仅是集体行动的意识，甚至包括对公共交流的需求。它鼓励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工作很辛苦，所以下班后就应该躺平、购物，把接受一切快餐式娱乐理解为自我照顾，而不再有关心社会问题的责任。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不再具有公共性，变得犬儒，失去行动力。

既然不被允许形成一个可见的集体，那么个人就成为运动主要的承担者。这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必须回到自身，去思考运动如何持续。

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一切皆有可能。但如果还对抵抗抱有希望，就不能自欺欺人，必须想像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行动层面，反抗的防线即便退缩到最后，也应当守住一个底线：即便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自身也不能被它所改变；在意识层面，则要永远拒绝将眼前的一切不公视为“正常”。这或许是个体最后的责任——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行动上，尽量不向这个体制缴纳“服从税”。这样至少运动的碎片能在我们的体内得以保存。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重新确认“女权主义”一词本身的重要性。三十年前，当我投身女权运动的时候，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环境里是惊世骇俗、令人畏惧的。但当时我们还拥有机会，通过积极地认领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并为此正名，维持自身的激进性、发展行动主义的社群。而今天，“女权主义”在中国互联网已经不被允许传播，作为替代，人们开始使用弱化了权利意识的“女性主义”，甚至连后者也正在被消除。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倒退。

因此我们要在被禁止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留并使用“女权主义”这个词，这可能才是微观抵抗的意义所在。当然，每个人能够承担的代价与冒险程度，始终由自身决定。

此外，我们还是要探索和延续不同的组织形式，彼此守望相助，将个人的实践连接起来，维持运动的韧性。

